

## 第六章 結 論

本文的寫作意圖，主要是以現代性為媒介，來探究初期臺灣現代文學的發展動因及其情況。現代性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以及人的自我發展為核心內容。因此，本文試圖透過過去臺灣文學所指向的內容，來預期正在進行和將來也會持續進行的資本主義的現代，對文學如何的影響，以及文學又應如何的因應等問題。另外，透過這樣的考察，期望能化解現今臺灣文學研究所面臨的現代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分歧現象，以及因意識形態的不同，在整體臺灣文學的理解上所造成的障礙和過度的主觀性問題。在此意圖之下，本文將時間分成日據時期和戰後初期，各時期再就時代精神、文學理論，以及小說所反映的現代性，加以詮釋。茲將本文中已探討的內容整理如下：

在二〇年代，處於日本殖民狀態之下的臺灣，透過與世界的接觸，開始接受以啓蒙和進步為原理，以理性和科學精神為核心內容的現代思想。隨著日本在臺灣所實施的資本主義，臺灣人民也逐漸體驗到資本主義帶來的現代經驗。初期知識分子接受現代性的過程，是從對普遍現代性的自覺和啓蒙，發展到對民族處境的自覺。可見知識分子首先把由日本和中國所接受的西歐現代文明教育給民衆，讓他們有所啓發，之後再追求獨立的國家和獨立的文化。他們開始主張政治上的自治、言論上的自由、教育上的平等，進而推動「臺灣議會設立請願運動」。『文化協會』的成立，就是說明追求普遍現代，以及對民族處境的自覺與改善要求，才是該時期文化啓蒙運動的核心內容。在他們主張文化啓蒙和民族獨立的根柢，具備著個人自

由、人格尊重、理性思考、平等意識、人道主義精神等西歐現代性。也就是說他們以現代性為依據，主張新文明的正當性和民族處境的改革方案。

然而，啓蒙時期的時代精神所反映的現代性，具有不同於西歐的現代面貌。首先，啓蒙時期的知識分子，接受日本所實施的資本主義化物質基礎—技術的、工具的、制度的現代性，同時也積極指向日本故意忽略的科學精神、合理主義和理性。另外，臺灣的殖民地處境，也使他們強調及再認識中華民族的文化、歷史、思想等民族主義精神。這些都不同於以反封建為首要價值的西歐或中國的現代性。

隨著日本的殖民體制日趨完善，對臺灣的經濟榨取也日益加深，主導文化啓蒙的知識分子，在因應殖民資本主義以及追求民族獨立的過程中，分化為左右翼，各自追求不同的路線。右翼民族主義陣營，主張在體制許可的範圍內，持續的推動政治的自治；而左翼社會主義陣營，由於受到世界性社會主義擴散的影響，將抗日民族運動的方向，從啓蒙轉移到解放，帶來質的變化。同時，社會主義是以擁護弱小民族及無產階級為主要目標，因而對普遍的現代性提出質疑。他們追求的是反封建、反帝國主義，並且打破資本主義發展所帶來的貧富差距、人的物化與疏離現象等，以追求反資本主義現代性。由於在日本所主導的殖民資本主義化過程之中，於分配經濟利益上，造成嚴重的不均衡，並且情況日益嚴重，因此，以經濟層面上的壓迫/被壓迫、榨取/被榨取關係的解除為主要訴求的社會主義理念，遂得到民衆的青睞，並逐漸擴散至大眾之中。早期在文化啓蒙運動中，民衆是一個受教育、被啓蒙的對象，而在社會主義運動中，民衆升格為民族運動的主體，呈現出屬於第三世界國家的現代性特徵。確保民衆性，以及在民衆性的基礎上追求解放的現代性，乃是日據時期社會主義運動的精神所在。

但是，到了日據末，日本全面展開對中國大陸的軍事侵略行動，在臺灣推動皇民化運動，不過這些努力開始面臨空前的挑戰。所謂皇民化，就

是要把臺灣人改造成日本人，更精準地說，改造成能夠為日本犧牲性命的人。而皇民化的內在原理，即是天皇制法西斯主義，它是在具有封建性質的天皇制之中，加入資本主義的產物—帝國主義所融合而成的。日本假藉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美名，將臺灣人民動員到他們所挑撥的戰爭裡。臺灣知識分子經由啓蒙企畫和社會主義方案，來追求現代性的努力，在皇民化的暴力下，遭到嚴重的打擊。

日據時期的文學理論，首先透過新舊文學論戰等新文學運動，確立了言文一致的現代文體，從此作家們開始運用白話文創作。在新文學運動的胎動期，文學被當成現代文化的啓發工具，同時也是能夠保有民族文化的手段，因而，實用觀點的啓蒙主義文學觀普遍被文人所接受。不過，現代初期的文人，同時也認為文學應擺脫被當作遊戲或實用工具的傳統觀點，強調文學的獨立性與自律性，並且肯定透過文學進行個人的感情與感覺的抒發。因此，在重視個人的解放、個性的尊重、文學獨立性的同時，亦接受國家、社會統一性思考，因而產生了無可避免的矛盾。而這些矛盾正是殖民地臺灣在接受文學現代性的一個特殊樣貌。該時期的文人都重視個人的感情與個性，也強調文學的社會義務，而這兩種無法調和的目標，就成為該時代必須解決的課題。另外，他們在文學創作方法上，提出了現實主義，認為描寫出客觀現實的原貌，才是首要之務。因為唯有如此，才能找出改造社會、振興民族文化的方法。

接著，社會主義運動在臺灣廣泛被接受，民衆成為民族運動的主流，文學理論的建構也開始注意到民衆的存在及其角色的扮演。社會主義的左翼文學理論，依照從對民衆的重視、無產階級文藝的主張、左翼文藝雜誌的發行、左右翼合作的組織性文藝運動等順序展開。並在這些發展過程中，提出文藝大眾化論，且經歷臺灣話文論戰與鄉土文學論戰，於是確立了文學的民衆性。而在創作方法的討論上，仍然延續啓蒙時期的現實主義，其中有些人士甚且已開始介紹及主張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各種理論。

在社會主義左翼文學理論展開的同時，屬於右翼民族主義陣營的葉榮鐘與張深切也提出了「第三文學論」與「道德文學論」，針對左翼文學理論的劃一性表示不滿，共同主張創作出具備民族、集團特殊性與鄉土性的文學。對於他們所提出的主張，在本文中分析為左翼運動的退潮，以及與滿洲事變後日本對殖民地的政策有關。那就是三〇年代左翼運動的失敗，並不是單純的政治運動的沒落，而是讓現代的理念和實踐變為可能歷史性思考，亦即將現代化轉為歷史必然發展的想法，再也無法持續的一種訊號。加上，隨著法西斯主義演變成國際性現象，在歐洲和日本盛行文化國粹主義之際，追隨西方前例的普遍性文化追求，在世界各國普遍受到質疑。在普遍現代的理念快速動搖之時，得到文壇熱烈討論的，就是被認為能代表民族文化獨特性和價值的過去遺產以及其收集熱。右翼民族主義理論的擡頭，正能說明此一現象。

但是，無論左翼的普遍主義或右翼的特殊性，到1937年以後，在日本的强大皇民化壓力下，臺灣文學的理論建構與討論，受到空前的壓迫。不僅中文創作被禁止、文藝雜誌遭到廢刊，連當時的文人也被動員到日本所挑撥的侵略戰爭的暴風之中。包括文學的所有文化活動，完全被控制在國策範圍之內，文人也必須協助日本的要求。皇民文學的主要內容，除了強調日本民族的優越，進而將它注入殖民地以外，並要設法把日本挑起戰爭的行為合理化。而且隨著戰事的推移，文學扮演起強調皇國精神、確保與日本之間的一體性、協力戰時經濟體制、勤勞生業保國、後勤支援，甚至鼓吹臺灣青年走上戰場等的角色，完全脫離了臺灣現代文學所追求的個性的解放，以及擁護民衆變革期望的文學現代性。不過，面臨空前的挫折，以楊逵為首的臺灣文人以擁護現實主義，來對抗抹殺文學的日本皇民文學要求，仍然堅持反對日本加諸於臺灣人民的扭曲的現代性。

如上所述，日據時期的時代精神與文學理論所包含的現代性，在小說中一一得見。第一、在1926年以前的過渡期小說中，以探究民族所處的狀

況與涉及個人自由的問題居多。其中《神秘的自制島》、《犬羊禍》、《臺娘悲史》、《黃鶯》等小說，對臺灣淪為殖民地的歷史提出反省及批判，而《她往何處去》、《家庭怨》、《最後的解決如何》等小說，則批判舊家庭制度的不合理，主張婚姻自由。這些初期的小說，在形式上展現的是從古典形式轉型到現代小說的過渡形態；但在內容方面，卻明白地體現了當時的時代精神—文明開化和愛國啓蒙思想。另外，張我軍與楊雲萍的小說，主要是以人物的內心為敘事主體，透過人物的苦悶、無奈、煩惱和憤怒等情緒，來刻畫因意志的薄弱，從而產生挫折、彷徨的現代人。這說明臺灣的現代小說，已從文化啓發、民族自覺等時代性任務的訴求，逐漸轉向夾在傳統和現代之間的人的內心描寫。這種現代人的彷徨與苦惱，代表著臺灣已進入了金錢所支配的現代社會，而這些作品即能喚起讀者對物質現代性的反省。

第二、到了1926年以後，臺灣現代小說在質與量方面，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其中，賴和主要針對法律問題，提出嚴重的批判；《一桿稱仔》、《不如意的過年》、《惹事》、《豐作》等小說，嚴厲批判日本警察任意適用法律的弊害，直接質疑標榜現代化的日本，在臺實施的法律的正當性。他對日本帶來的現代性的質疑，在《蛇先生》中表露無疑。在這篇主要以象徵現代科學的醫學根據與傳統秘方之間的對照為架構的小說中，賴和縱使以批判的角度看待秘方，但是對蛇先生的醫療行為，卻沒有提出異議，反而對以非科學為理由誹謗蛇先生的階層，表露出嫌惡與不信任。可見他所希望的是一個合理的現代精神能成為思考和行動準則的世界，但他非常清楚只要帝國主義繼續支配一天，他的願望就無法實現，而他所追求的合理公平的世界，就在支配階層和既得利益階層的橫暴與蠻行下，遭到毀滅。因此，賴和小說中所反映出來的現代性思考，可以說在缺乏自主性改革的殖民地臺灣，現代價值和文明準則遭到帝國主義價值觀的擺布，成為奪取和壓迫的對象。

另外，陳虛谷和蔡秋桐，也對殖民支配的正當性提出質疑。但是，他們與賴和不同，採取諷刺的手法，對日本官吏和警察的自私、無理、橫暴等行爲，加以批判。《他發財了》、《放炮》、《無處申冤》、《奪錦標》、《王爺豬》和《理想鄉》等小說中的日本官吏和警察，都是爲了個人的升遷，動員老百姓參加各種美化環境、衛生事業等活動，被描寫成貪小便宜、自私自利，甚至爲好色之徒。在這些小說中，作者將日本殖民者塑造成在道德水準和人品上有瑕疵，並且公私不分的人物，對日本人統治臺灣的正當性，提出強烈的質疑。

第三、隨著殖民資本主義的經濟榨取日益加深，在臺灣社會形成嚴重的階級分化，許多作者開始以否定的觀點，面對現實狀況。他們大部分站在佃農、勞工，以及屬於該階級的婦女立場上，對貧富差距、失業、勞動環境等問題，提出不滿與批判。楊守愚、張慶堂、林越峯、徐青光、賴賢穎、馬木歷等人，主要描寫佃農與農村的貧困。從他們的小說中，可以發現臺灣農民從自耕農沒落到佃農的原因，就是由於日帝爲了增產穀米所進行的土地掠奪，以及製糖公司的土地集中作爲所致。在這個過程中，農民要承受種種不公平的待遇，例如農民在不公平的條件下，跟地主締結只對地主單方有利的契約；日本在農村引進資本主義之後，地主/佃農脫離了以前的保護/依賴關係，地主按照資本的邏輯，對佃農進行無情的榨取和略奪；殖民政府所主導的水利設施等現代農業制度，規定自耕農和地主有繳納各種稅金的義務，致使地主從佃農處抽取稅金。而在這些農民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背後，則是爲了振興自己國內的產業，瘋狂地搜刮殖民地的資源，默許甚至聳恿地主和製糖公司的日本殖民政府。

此外，楊華、陳賜文、鄭登山、孤峰、赤子、一吼、李泰國、廢人、柳塘等人，主要描寫勞工和都市貧民階級的悲慘生活，而在小說中呈現出對造成階級分化的社會結構有所覺醒；至於賴和、楊守愚、楊華等人，則特別關心在殖民支配結構中，處於最低層的無產階級的太太和女兒們。這些

女性因為身為無產階級而遭受壓迫，同時也因為身為女性，成為被迫害的對象。

左翼傾向濃厚的這些小說，為日據時期小說中的最大宗，可見作者眼中的當時臺灣現實狀況是非常悲觀的。無產大眾的貧窮現實，以及階級差別的加深，使民衆開始思索自身所處的社會環境，並讓他們覺醒無論再怎麼努力，還是無法擺脫日益貧窮的現實。因此他們從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之中設法找出原因，並開始摸索能夠改善現況的方法。《恭喜？》、《過年》、《元宵》、《擦鞋匠》、《謀生》、《失業》等小說，反映出對即使努力勞動也不能保障生存的社會的憤怒，以及剛萌芽的階級意識。經過《決裂》、《失敗》、《阿枝的故事》中知識分子和勞工的努力，到了楊達的《送報伙》終於得到無產階級的勝利。小說中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從無產者的覺醒開始，經過意識化過程，最後付出團結的實際行動才完成。楊達的這篇小說，無論是教育主角的知識分子—新人物的出現，或是被他們感化的主角回國後展開農民運動的內容等方面，都呈現出鮮明的階級意識，以及提出無產階級解放的歷史方向。我們從這些左翼小說中，明確地看到無產階級意識已經萌芽，並且出現為了擁護無產階級的利益和解放，而努力奮鬥的人物類型。這類小說的最終目標，在於打倒造成階級矛盾的資本主義體系，強烈反映出社會主義思想。而這些左翼小說，對殖民資本主義的進展所帶來的現實條件，表示出否定、批判及反省。

第四、殖民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進展，不僅造成民族內部的階級分化與緊張，也對臺灣人民的日常生活，帶來絕望與無奈。他們得不到任何現代化的果實，因此無論農村與都市的貧民，或知識分子都呈現出疲憊的神情。蔡秋桐的《新興的悲哀》、朱點人的《島都》和《秋信》，均揭露都市化及現代都市的黑暗真相，對現代化本身保持否定的態度；而呂赫若的《牛車》、馬木歷的《西北雨》，分別描寫日本的機器代替傳統的牛車，以及日本推動的水利事業，反而造成貧農有水不能引用的荒謬情景，共同對農村

現代化提出批判觀點。

另外，隨著現代化朝向壓搾臺灣民衆的方向發展，未能改善臺灣民衆的生活，在都市裡已形成了由底層勞工和從農村分離出來的農民所構成的都市遊民階層；而在農村，佃農的貧窮化也日益加深，全體臺灣社會普遍蔓延著嚴重的疏離意識。這些瀰漫於社會的相對剝奪感，造成了價值觀的顛倒、貨幣物神化，以及知識分子的無奈現象。《年關》、《牛車》中的貧民，因饑餓、對有錢人和殖民統治階級的不滿，拋棄了道德良心和法律規範，做出反社會的行為；而《乳母》一篇則表現出，母乳的原本價值遭到扭曲，成了交換價值的商品的現實。此外，在朱點人的《紀念樹》、《長壽會》，以及楊守愚的《赤土和鮮血》、林越峰的《紅蘿蔔》、張慶堂的《他是流眼淚了》等小說中的人物，與其他人維持表面的關係，甚至將他人視為商品。他們都是些表裡不一，行為和想法互相衝突的偽君子。殖民地狀況與資本主義矛盾，在造成都市貧民和農民的貧窮及疏離的同時，使得知識分子也迷失了自我，逐漸落入自我疏遠和無奈的情緒之中。王詩琅的《沒落》就解剖了失去熱情的社會運動家的失落心理。

第五、除了批判當代社會情況的小說之外，翁鬧、巫永福等東京留學生，也於三〇年代開始創作以描寫個人內心為主要敘事的小說。其內容從徘徊東京街頭的臺灣青年的種種煩惱開始，到探究愛慾、解剖自我內心等等，深切的反映出個人主體性的自覺。《殘雪》、《山茶花》、《慾》等小說透過戀愛心理，主要呈現的是日常性。所謂日常性，包括比較不受制度、因果關係、社會禁忌和合理性等約束的領域，涵蓋了支配現代人生活的全體。日常性呈現在小說裡，容易使我們把視線投注在不受目的或未來等所壓抑的現在。因此，在這些小說中，殖民地處境的民族、歷史問題，不再成為人物產生變化的因素。這些小說並未提示任何烏托邦的理想或展望，只以日常性作為結尾；作者藉此似乎在告訴我們，小說提示的未來展望，在現實世界裡並不易達成。而這些小說對日常性的重視，可能是作者只想承

認現在，真摯的面對現實，此乃這類小說面對現代性的方法。

多數青年感到苦惱的主要原因，來自舊家庭和婚姻問題。因此，對封建舊家庭問題的探討，由於逐漸與個人主體性的確立產生關聯，開始朝向更有深度的方向發展。呂赫若在這個時期以舊家庭制度中女性的婚姻，及資本主義滲透農村社會的狀況為題材，描寫封建家庭制度沒落的過程。他的《逃跑的男人》、《財子壽》和《風水》等小說，都同時探討了傳統舊家庭秩序面對金錢之時，如何沒落與凋零；而在《廟廷》、《月夜》、《女人的命運》、《前途手記》中，描寫地主階級的納妾行為和以男性為主的傳統觀念，在經過資本主義的洗禮之後，反而變得更加嚴重，女性成為最受苦的一群。呂赫若小說中的加害者，大多是能夠預知受封建秩序與價值觀所支配的農村社會即將崩潰，同時金錢至上的新時代即將到來的人物。他們都是一方面受金錢所奴役，另一方面又固守著老舊而負面的封建價值。呂赫若透過描寫這些人物的行為，深刻地演繹出封建性與資本性蔓延的殖民地臺灣的社會變遷。

第六、對於殖民統治下的社會現實和資本主義現代性，以現實主義的角度，進行批判性理解的現代小說，到了1937年以後，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危機。隨著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的相繼爆發，日本變為強大的法西斯集團，對殖民地臺灣實施廢止漢文、創氏改名、改造生活方式等抹殺民族性的政策。面對如此可能失去民族性的空前危機，臺灣作家仍然無法逃離日本精神、戰爭動員、勤勞保國等許多皇民化課題。而且，日本所主張的「大東亞共榮圈」，是一種對抗西方諸國，強調亞洲民族團結一致的理念。其中特別強調，資本主義與個人主義思想所帶來的一些負面作用，全是西方思想的產物，與日本無關。藉此便能塑造日本聯合亞洲民族對抗西方諸國的假象，並且強制臺灣人接受日本性。日據末期小說的焦點，主要聚集在臺內親善、從軍、民族認同等皇民化運動所強調的幾個議題；其中，涉及臺內親善的有龍瑛宗的《蓮霧的庭院》、《歌》和呂赫若的《鄰居》、《玉蘭

花》等；涉及增產主題的有張文環的《夜猿》、楊達的《增產之背後》，以及呂赫若的《山川草木》和《風頭水尾》。這些小說，雖然皇民精神的內在化程度各有不同，但是總體來說，呈現出又複雜又曖昧的面貌，因此解釋上具有模稜兩可的空間。此外，龍瑛宗的《午前的懸崖》、張文環的《頓悟》、呂赫若的《清秋》描寫關於從軍的情節與看法，前兩者小說中所鼓吹的從軍主題，並沒有與小說內容產生有機融合，導致敘事失敗，乃至無法對讀者發揮文學效果；而後者中的從軍或去南方，也不具有什麼重要性，只是充當應對皇民化的掩飾。可見作家們並沒有正面面對此一課題，而是採取了迴避的方式。

另外，在接受日本性的問題上，在皇民化時期以前，作家們可以堅持自主性立場，主要顯露出批判或反省態度，例如對《榮歸》、《興兄》和《脫穎》中的追求日本性人物，作者們都以諷刺、批判的對象來處理。但是到了皇民化運動時期，日本爲了圓滿推行戰爭，將日本性代替現代性，強制臺灣人民接受，因而在日本性的接受上，作家們開始呈現曖昧複雜、煩惱不已的面貌。從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王昶雄的《奔流》、周金波的《水癌》，到陳火泉的《道》，接受日本性的程度越來越深，反映出皇民化邏輯帶給作者的精神荒廢。在這些小說中的人物，單方面接受了八紘一宇、武士道精神等日本固有文化，但對現代性却一律未提出任何思考和反省。可以說，自啓蒙運動以來，臺灣文學有自主性追求的現代性，到了皇民化時期完全遭到否定，甚至於倒退至承認神權的地步。

經歷了半世紀之久的殖民統治，到了1945年，由於日本的敗戰，臺灣終於重新找回主權，並立刻進入了戰後國際秩序的再編過程中，歸屬於國民黨政府所領導的中華民國，迎接新的歷史階段。得到期待已久的光復，當時的知識分子爲了實現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夢想，開始主張政治上的自治和民生的安定，以及消除日本殘滓和推行中國化。這些臺灣知識分子的主張，符合國民黨政府所提出的三民主義內涵，因而建立現代國家的期待得

到共識。他們並且依據從二〇年代以來即接受的普遍性現代價值，開始重新強調反封建，接受科學思考、理性判斷，以及遵守法律的行動規範，認為這些是建設開明的社會、現代國家的國民所必備的要件。而在這個基礎上，不僅塑造出具備民族意識，同時也具備科學、效率、責任和法治觀念的理想國民形象。不過，在日益嚴重的物價暴漲、產業麻痺、失業增加、教育荒廢和治安危機等社會狀況之下，大多數民衆得不到安定的生活，加上省籍衝突，臺灣陷入嚴重的混亂局面。在這種社會條件之下，累積國家資本，建設現代國家的希望，變得越來越困難。然而戰後初期知識分子所主張的內容，無論在現代國家的建立，或現代普遍價值的追求，都非常重視民主主義原則與批判精神，可以說從二〇年代接受啓蒙主義以來所堅持的現代性，在面對新的歷史階段，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在期待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同時，臺灣文人也爲了重建臺灣文學而站了起來。自新文學運動以來，一直站在民衆和民族的立場，堅持著現實主義路線的臺灣文壇，一方面堅持既有的立場，另一方面透過與大陸來臺文人的交流，開始接受同一傾向的祖國文學。雖然兩邊文學交流的時間過於短暫，但是以魯迅爲媒介，雙方在文學的角色及理念上得到共識，那就是以進步的、民衆的文學做爲往後臺灣文學的方向。而比較具體的文學理論，以《新生報一橋》副刊爲舞臺展開，文學界人士開始積極討論臺灣文學應有的方向，最後還發展爲臺灣新文學論戰。這場論戰討論包含臺灣新文學的性格與成果、臺灣文學的民族性與特殊性，以及人民文學論、新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確立等諸多內容，可以歸納爲現實主義民衆文學論。可見戰後初期臺灣文學的理論，繼承了新文學運動以來的日據時期文學傳統，以及大陸的進步文學傾向。

而戰後初期的小說，反映出時代精神與文學理論所提出的想法，例如光復的喜悅、批判皇民化及反省，以及對新的現代社會、新的現代國家的願望等內容，開始成爲小說的主題。不過，其中比重最重的是揭露戰後初

期混亂社會情況的小說。這可說既實踐了當代文學理論，同時也具備了時代必然性，因為它記錄了戰後初期社會不安和民生問題的嚴重性，也適切地反映出戰後初期臺灣人民的感受—政治上的期待與挫折。

由以上的分析和討論，我們知道，臺灣之步入現代，是受到早已接受西方現代文明洗禮的日本的影響。在這個過程中，早期知識分子想用西方的現代，來克服西方現代所造成的殖民地困境，結果卻面臨了進退維谷的矛盾局面。因此，他們的現代化方案，不得不帶著固守民族性和追求普遍性的雙重性格，而這也正凸顯了臺灣的現代性，有別於彼岸及其他西方國家的特殊面貌。另外，它與其他國家一樣，同樣受到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制約，在追求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且由於民族意識的擡頭，在追求建立現代民族國家之時，却導致階級和個人的基本權利受到威脅，特別是面對日據殖民統治和戰後初期的混亂局面，階級和個人的發展均產生嚴重的不均衡現象，不過，他們却又不遺餘力地追尋自由、平等、博愛的人道主義精神，同時也追求反資本主義的解放的現代性。

臺灣初期的現代文學，為因應上述時代精神，而主動積極地追求多元的現代性，一方面肯定了文學的獨立自主性，另一方面也尋找民族文學的形態與理念，提出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並確立了文學的民衆指向。而此指向起因於反帝國主義和進步的社會主義，不但具備了民族性，同時也具有擁護民衆及個人利益的傾向。因此可以說，它呈現了多重文學現代性的面貌，在重視建立民族文學的同時，也重視文學用以抒發個人感情的功能。

因此，日據時期和戰後初期的臺灣知識分子，他們站在民族、民衆和個人立場上，所追求複數的、指向於解放的現代性的經驗，對面臨著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衝擊，而被迫面對國家層次的全面性開放，並苦於思索因應之道的我們，帶來的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方向及空間。